

多模态话语建构中修辞与设计的运作模式研究^{*}

张德禄

(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2)

提 要 本文重点探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修辞与设计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探讨修辞和多模态修辞的关系;然后探讨修辞和设计所属的层次及其性质;接着探讨它们各自的分工;最后探讨修辞和设计的一体化运行模式。研究发现:1) 修辞和设计分属不同的层次,但它们不能被植入任何一个现有的层次中,而是处于两个层次之间:修辞处在语境层和意义层之间,设计处在意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之间;2) 修辞的分工是根据语境和交际意图等来选择适切的意义模式,而设计的分工是根据选择的意义模式选择合适模态集合及其配置关系;3) 修辞和设计形成了一体化运行模式。现在这项研究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索,通过语料库、试验、统计计算、大数据等方法来确认这项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并且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 修辞 设计 多模态话语 意义建构 一体化运行模式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4.05.009

一、引 言

传统上,修辞学(rhetoric)是研究话语生成的学科,而且话语在这里只指语言话语。例如,在古希腊时期,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重点是演讲(Aristotle 2007),属于口头语言话语。在其后的布道修辞和书信修辞研究中,研究重点仍然是语言:口语或书面语。多模态话语研究出现后,“修辞”(rhetoric)被用于探讨多模态话语建构,与“设计”概念相互配合,成为多模态话语建构的两个核心概念和主要构建步骤。但在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中,“修辞”概念的地位还不清晰。他们把多模态话语分为四个层次:话语(discourse)、设计、生产(production)和分布(distribution),但却没有给修辞一个确切的位置。直到 2010 年,在 Kress (2010: 26) 中,“修辞”才替代“话语”成为多模态话语建构研究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这里,多模态话语的建构主要涉及三个层次:修辞、设计和生产。“分布”在此则没有

^{*} 本研究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配置的机制和机理研究”(项目编号:22BYY002)的阶段性成果。

做进一步讨论。据此,在这个新的框架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包括:修辞的作用是什么?修辞和设计的关系是什么?修辞和设计结合形成的话语建构模式是如何运作的?本文重点回答这些问题。

二、从修辞学到多模态修辞学

在西方,修辞学诞生于古希腊时期,重点研究演讲的技巧和论辩术,即如何能在论辩和演讲中说服对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2007)把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都能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Moral & Ballif 2000: 24)。其后,修辞学被用于传教和书信写作,因此,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传教和书面语。到了20世纪中叶后,修辞学除了研究语言交际之外,还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

由此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修辞学的研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某个领域,如演讲、写作、艺术等,而是扩展到所有的人类交际领域。随着现代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交际的网络化、屏幕化和多媒体化,人类交际由页面为主进展到以屏幕为主,或者以多符号共同构建交际过程为主,交际的主模态逐步由文字转化为图像,预示着多模态话语交际时代的到来。据此,多模态修辞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多模态修辞可以说来自于三个传统研究领域。第一个是社会符号学传统,韩礼德(Halliday 1978)提出了“语言是社会符号”(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的论断,使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自然延伸到由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一起建构的话语中,使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修辞成为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是视觉修辞研究,开始于法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巴尔特(R. Barthes),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图像修辞(rhetoric of the image)概念,重点探讨了图文关系,语言和图像的意义是如何互补的。第三个是多模态论辩修辞,随着屏幕逐步成为交际的主渠道,许多论辩手段不仅可以通过语言实施,还可以通过图像和其他视觉成分实现(见Groarke 1996; Slade 2002; Kjeldsen 2007; Roque 2012),这些非语言手段被称为“论辩模态”(modes of arguing)。

在这三个多模态修辞的来源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修辞理论最具普通修辞学的特点,适用于研究运用所有模态及其相互协同的多模态话语建构,也适合于探讨任何形式的多模态话语交际。因此,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来探讨修辞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理论,传统上属于修辞研究的领域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意义建构部分,即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来建构话语的意义;二是意义体现(表达)部分,即在可及的符号资源中选择合适的模态或模态集合来体现话语意义。前者是修辞的主要研究领域,后者则是设计的主要研究领域。

三、修辞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

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而功能的实现是通过两个方面的不断选择而

形成的,一方面,是在每个层次上从系统到实际的选择,使这个层次上的系统特征转化为语篇特征;另一方面,是从上个层次到下个层次的选择,即语境层的特征促动了对话语意义层上的特征的选择;同时,对话语意义层上的特征的选择又促动了词汇语法层上的特征的选择;同样,对词汇语法层上的特征的选择促动了音系层上的特征的选择,而对音系层上的特征的选择又促动了语音层上的特征的选择。这样,语篇的实现就是从语境进入,最后,由实体特征(声音或文字)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层模式可简单由图1表示。这样,语言是一个由四个层次组成的系统: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语音层,层次之间是体现(realization) 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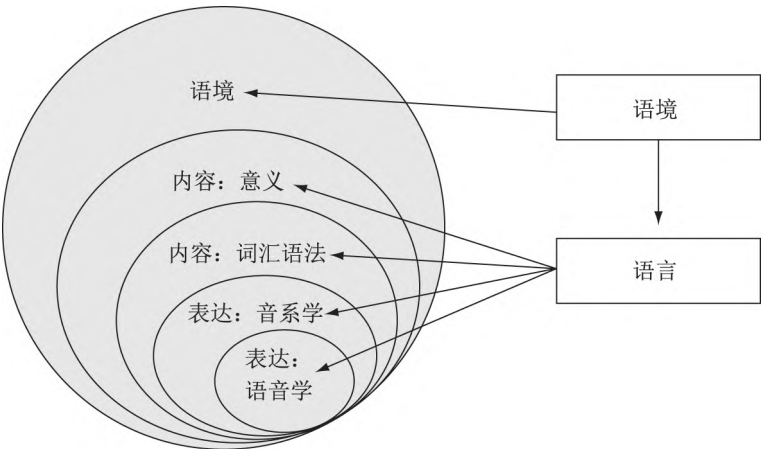


图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层模式(根据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Fig.1-10 改编)

这个模式是针对语言做出的,反映了在语言话语产出中,各个层次的语言特征如何汇聚在一起形成话语。如果要使它适用于多模态话语分析,还需要做一定的修改和扩展。例如,它无法表现某些语境特征如何促使话语产出者在话语建构过程中做出选择,特别是对与其个体性密切相关的特征,如交际目的、兴趣、义务等的选择,以及现有交际资源对他的制约作用,如有哪些媒介资源可以作为模态来体现这些意义模式等。

如果把话语产出者的动机、兴趣表现出来(见 Kress 2010) ,把话语产出的过程显性化,就需要把话语产出者作为一个主要因素,表现出它的积极作用。这样,就需要在以上模式中增加话语产出者如何起作用的方式,即在以上五个层次之间增加中介层次,表现上下层次的实现过程。这样,在语境和话语意义之间增加修辞中介层,其作用就是要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及个人的兴趣和交际目的等来选择话语意义,构建话语意义模式。接着在话语意义和词汇语法之间增加设计中介层,这样,设计的作用就是: 如何根据话语意义模式,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即适切的模态和模态集合,并使其相互协同来体现话语意义。在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之间增加生产中介层;生产的作用就是把所选择的模态用恰当的媒介(包括声音、字符、图像、手势等) 体现出来,使模态实体化、现实化。最后,在媒介层和实体层之间增加分布中介层,分布的作用是把体现媒介的实体现实化,置于它们合适的位置和语境中。我们用图2来表示多模态话语层次及其中介层次之间关系(另见张德禄 20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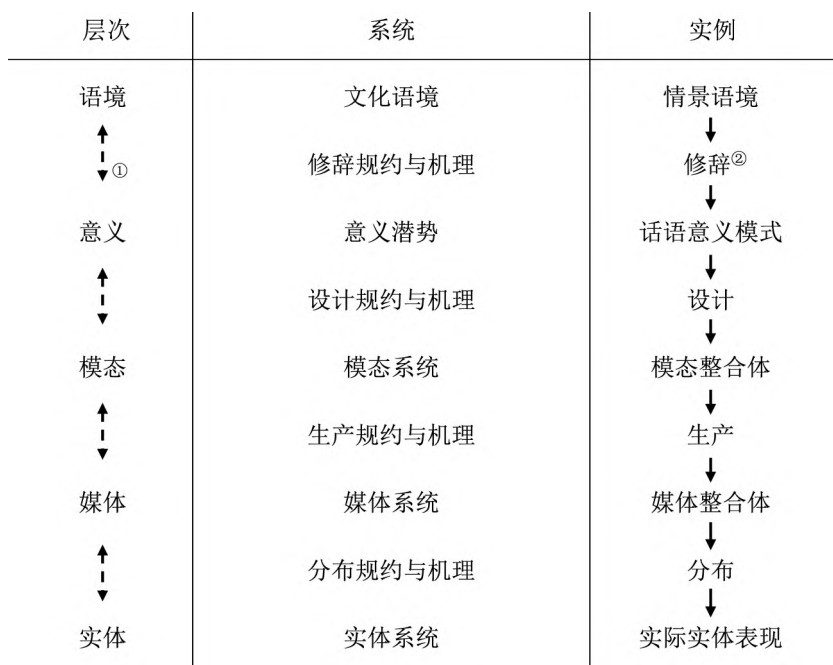


图2 多模态话语层次及其中介层次之间关系

四、修辞与设计的分工

当我们把修辞和设计作为两个不同的中介层次之后,它们的不同作用就突显出来。修辞的作用是解决说什么的问题,在多模态话语中,还涉及写什么、画什么、制作什么、做什么等;设计的作用则是解决如何说的问题,涉及如何写、如何画、如何制作、如何行动等。

然而,传统修辞学把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修辞,即话语意义及其模式的选择上,同时也没有区分修辞和设计。修辞通过建构合适的话语意义模式来实现交际目的,可以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1) 修辞活动可以接受外部因素的驱动和影响,即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影响,从而构建话语意义;这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修辞者”,对以上所示的语境因素做全面的评判,确定根据现在的形势和环境,他应该做什么。2) 作为一个主动的修辞者,他还具有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要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情景,力图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通过交际实现他自己的意图和愿望。

设计活动也要利用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合力来使社会交际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从外部看,根据修辞活动选择的话语意义特征及模式需要以最合适的方式体现出来。从内部看,修辞者会认识到现有哪些符号资源可以用来进行新的交际活动,同时,也会认识到以上的话语意义模式需要什么样的符号资源来以最佳的方式体现这些意义。在此,修辞者成为设计者,一方面涉及设计者运用符号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涉及他的判断能力。

鉴于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两者具有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即在修辞层对话语意义模式的选择决定在设计层对模态的类型、多寡和配置模式的选择。

五、修辞和设计的运作模式

虽然修辞和设计属于不同的层次,但它们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同时运行,共同实现交际者的交际目的。

5.1 修辞和设计各自的运行路径

修辞的主要作用是把社会文化因素与话语意义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个操作层次。首先,它需要对文化语境,即本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规约、惯常的交际模式等做出反应,如:是按社会文化规约规定的常规行事;还是不完全按常规行事,做一定改变;还是完全抛弃传统模式,采用新的模式进行交际等。同时,它需要根据交际目的选择合适的交际活动模式,即体裁。体裁从宏观上决定了交际活动的性质、整体框架、交际程序和步骤等。在这个总体交际框架下,交际者还需要确定具体的交际内容、交际者之间的关系、要表现的态度、情感、立场、采用的交际方式、已有的交际资源等。

这样,发话者还需对情景语境做出反应。从语场的角度讲,客观外界或心理世界发生了某种事件,它需要做出如何处理这个或这些事件的决定:是客观地表现它们,有选择地表现它们,还是经过处理后表现它们。从语旨的角度讲,发话者需要根据交际者之间的关系,确定讲话者以什么态度、口气、地位、角色、交际意图、个人兴趣等来与对方进行交际和互动,如:是提供信息,还是求取信息;是提供物品或服务,还是求取物品或服务;是交换信息,还是给予评判评价等,同时对受话人施加影响。从交际目的的角度看,发话者为了促使受话者接受他的观点、立场等,可以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裁剪、修饰,甚至修改。从个体兴趣的角度看,发话者总是喜欢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回避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从对受话人施加影响的角度讲,他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交际资源来影响受话人,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或与自己形成认同关系,还可以谋求和受众建立一定权位关系等。最后,从语式的角度讲,交际要通过选择一定的符号资源、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如:是面对面对话,还是打电话、发微信、视频对话、做大会报告、写论文和著作等。符号资源是直接和设计相关联的:一方面,符号资源是语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符号资源的类型和多寡将会影响交际者是否能真正精确地表达话语意义;另一方面,发话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修辞目的从现有资源中选择自己认为有效的符号资源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修辞和设计各有分工。修辞者关注社会文化中的交际现象,在交际过程中选择适切的意义及意义模式;而设计者是把修辞者选择的意义用适切的符号表达出来。就目的而言,修辞者是要使他自己的信息和立场与听众的信息和立场达到一致,相互认同;而设计者则是用已有的符号资源,以最佳方式,把修辞者与听众的信息和立场以最适切的方式表现出来(Kress 2010: 49)。

这样,修辞者和设计者虽然任务各异,但具有相同的目的和兴趣。而且在绝大多数日常交际中,这两个类型的任务是由同一个参与者来承担的,即修辞者亦是设计者。意义对于修辞者来说,他还需要根据听众的目的、兴趣和特点来修饰和调整,使其适合听众的特点。例如,对于儿童,修辞者应该选择适合儿童认知层次的生动形象的意义模式与他们交际,而设计者则应该选择更加形象和具体的模态来体现它;而对于成年人,修辞者应该选择更加概括和抽象的意义模式与他们交际,而设计者则应该选择更加概括和抽象的模态来体现它(Kress 2010: 50)。根据修辞者和设计者的这种关系,设计者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任务需要完成,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1) 设计者需要清楚修辞者在修辞过程中预设了哪些符号资源来体现话语意义。这类模态通常是这类意义模式的必选模态。例如,在大会发言中,交际者作为修辞者要选择他讲话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也确定了做大会发言的主模态:口语,以及一些次要模态,如站姿、面对听众(观众)、面部表情等。

2) 在当前的情景语境中,交际者还有哪些可用资源。除了修辞者在选择意义及其模式时预先选择的模态之外,交际者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些模态来实现他的交际目标。这一类模态是根据语境提供的现实条件决定的。例如,在大会发言中,除了口语,设计者还可以运用图像、文字、动画、实物等其他模态来使大会发言更加成功。这显然决定于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否存在这些模态可用。

3) 所选符号系统的供用特征(affordances)^③是什么——它在这个语境中体现的意义是什么?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每一个符号都有它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携带特定的潜在意义,或称“意义潜势”。Van Leeuwen (2005: 5) 曾说“一旦确定某个物理活动或者某个物体是符号资源,我们就可以描述它的符号潜势,即它创造意义的潜势。”Matthiessen & Kashyap (2014) 也在研究如何表现空间时,提出了从四个层次上解析符号意义的模块: 1) 物质世界, 2) 生命世界, 3) 社会模式及其交际行为, 4) 用以表现意义的符号。只有交际者作为设计者全面掌握了所选符号的所有这些意义,特别是核心意义和主要意义,他才能更加准确和恰当地选择体现意义及其模式的符号。

4) 哪些符号的供用特征通常相互配合,参与社会交际。每个符号都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意义潜势,同时,也在和其他符号相互协同完成社会交际任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在交际中惯常相互协同和配合体现意义的相伴模态。

5) 在当前的情景语境中,哪些符号的供用特征可以相互协同和配合来体现修辞阶段所选择的话语意义及其模式。在情景语境中,设计者要确定哪些符号的供用特征适合于相互配置,形成本次社会交际中所选择的意义及其模式,确定在情景语境中实际选择的模态及其配置模式。

5.2 模态配置的模块与框定

话语建构的设计阶段既涉及对适切模态的选择,也涉及如何使它们以最适切的方式相互配置,实现交际者作为修辞者所选择的话语意义及其模式。

传统上,日常交际的主模态是口语,远程交际的主模态是书面语。书面语交际的主媒介是页面,语言文字被记录在页面上,据此就形成了页面交际的设计方式。但进入新媒体时代后,页面设计逐步被屏幕设计所替代,人类交际被屏幕设计所主导,多种模态会同时出现在屏幕上,如图像、文字、口语、动画等。通过这种方式,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可以结合为一体,形成多模态话语 (Kress 2010: 144)。

模态配置是模态的组织方式,可体现社会的组织方式。模态配置是表达事实、虚构意义、情感意义等的形式特征,如表示中心和外围的对立,横向和竖向的对立,上与下的对立,左与右的对立,以及线性与平面的对立,圆与方的对立,方向、空间与时间的对立等各种模态组织方式都是模态配置。

模态配置最终是体现话语意义的,各种符号资源或手段都是用于实现语篇单位或语篇次级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语篇的基本标准是完整性,而完整性是通过语篇的衔接和连

贯实现的:在语篇内部,各种模态体现的意义相互关联,组成一个整体;在语篇外部,语篇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交际中起作用。

然而,模态可分为不同的维度,例如,语言单位是线性的,而图像单位是平面的。它们是如何能够整合为一体来共同体现语篇的意义的呢?任何现有的传统方式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据此,Kress (2010: 147) 用“模块”(module)概念来表示多模态语篇中的基本单位。模块可包含不同类型的符号,或符号复合体,它们是意义体,一个可以由不同模态协同体现的语篇单位,用以组成语篇或其他片段。每个符号都在这个意义体中具有一定的功能。这样,任何多模态语篇都可以划分为一系列“模块”;在模块组成中,不同模态的供用特征相互补充,组成模块单位。这一系列不同的模块再按照更高层次的模块的组成原则,形成新的模块结构,包括体裁结构成分等。

由于每个模态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所以,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同时,每个模态都在语篇的模块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因此,它们都有自己的形态和边界。这种形态和边界都是由框定(framing)表示的。框定表示语篇及相关符号体的空间和/或时间的范围和边界。这样,框架内的符号与框架外的符号是不同的。框架内的符号会形成一个整体,而框架外的则不一定这样。Kress (2010: 149) 说“在比较概括的符号层,‘框架’一词用以命名把某个符号体与它的环境中的‘前框架’或其他符号体区分开的符号资源。”没有框架我们就不能区分不同的符号及其边界,就不能确定符号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关联,也就无法实现所构建的不同层级的语篇“模块”。

5.3 模态配置的集合与协奏

在多模态语篇中有多个模态聚集在一起,形成模态集合。模态集合中的每个模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各自行使自己的功能,实现交际者的意义。Kress (2010: 159) 认为,交际者作为设计者要把多模态话语中的模态进行有效配置,形成一个结构体,并且各自发挥作用。同时,设计者是在交际过程中配置模态的。交际过程在不断向前推进中,设计者需在不同的阶段配置不同的模态结构体。再次以大会发言为例:大会发言形成一个由大会发言体裁决定的、充当体裁结构成分的一系列“模块”,在这些模块中都有一组或者几组模态集合。在每一个模态集合中,两个或多个模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大会发言的相关“模块”中发挥作用。而且每个模态都会根据自己的供用特征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模态集合在这个模块中虽然基本稳定,但也会有一定变化,如发言人变更、发言内容发生变化、发言者不再大量运用手势等。整个大会发言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直到最后“结束”模块出现为止。

模态集合中的每个模态都要根据它的供用特征而分别体现一定的话语意义,并且以一定的顺序出现。每个模态都是根据其自身的供用特征和语境的需要被选择的。在同一个模态集合中,它们相互协同和互补,融合为一体,称为“协奏”。这种“协奏”一方面表现为共时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也会表现为历时的接续行动,按一定顺序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模态集合和模态协奏都是用来描述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所选择的模态是如何相互协同和配置来共同体现多模态话语意义及其模式的。在修辞阶段,修辞者根据语境和交际目的及兴趣选择适合体现自己的交际目的的话语意义及其模式,包括由体裁决定的语篇类型(text type)及其结构。每个语篇类型的结构都包含一系列结构成分,表示话语意义发展的

阶段或步骤。这样,语篇结构以及其中的结构成分都为后续阶段模态集合和模态模块的选择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设计阶段,设计者会根据修辞者对意义及其模式的选择结果选择实现话语意义及其模式的模态及其集合和配置。具体来讲,设计者会首先从宏观上审视修辞者选择话语意义模式的目的和兴趣,然后了解这个意义模式的特点。他会把整个话语意义模式分割为不同的阶段:首先看每个阶段需要选择什么模态,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协同和配置来体现这个阶段的意义的;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看修辞者选择的意义有什么特点,并且根据其特点对所选模态进行配置;最后使它们相互协同和合作,形成协奏关系,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完成交际任务,达到修辞者的交际目的。

5.4 修辞与设计的一体化模式

修辞和设计是多模态话语建构的主体阶段。话语的核心是话语意义,而其他层次的因素都是为了建构和体现话语意义而服务的。语境因素是话语意义建构的动因,而媒介和实体都是为了使话语意义现实化。图3把话语生成的修辞和设计两个阶段融合为一体,形成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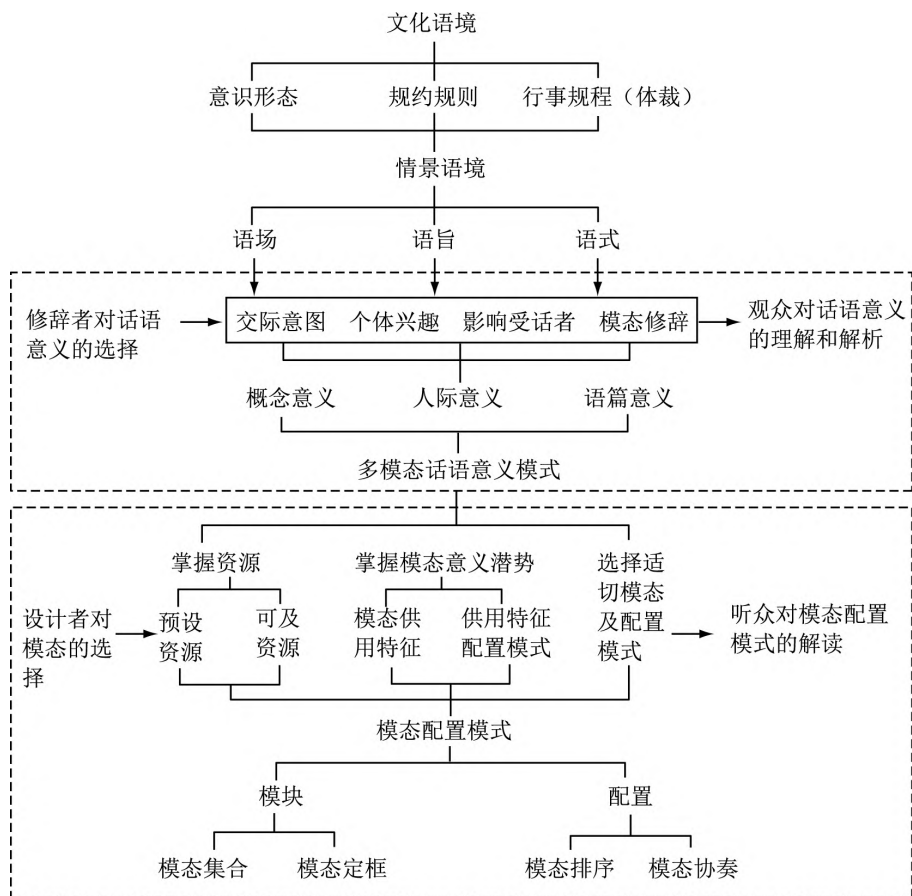


图3 多模态话语建构中修辞和设计的运作模式

在两者中,修辞是核心,是设计的前提,广义地讲,修辞包括设计。正如 Kress (2010: 43) 所述,修辞作为交际的核心包含话语生成的所有方面,从话语相关概念的形成,到整体意义构建,再到为表现某些特定内容所选择的模态等,都包含在修辞内。

六、小 结

本文重点探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修辞与设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多模态话语的产生使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只语言一种模态无法在现代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独自完成交际任务,而是要在通过修辞选择有效的意义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来选择适切和有效的模态及其集合来达到交际意图。修辞和设计分属不同的层次,但它们不能被植入任何一个现有的层次中,而是处于两个层次之间:修辞处在语境层和意义层之间,设计处在意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之间。这样,修辞的分工是根据语境和交际意图等来选择适切的意义模式,而设计的分工是根据选择的意义模式选择合适模态组合及其配置关系。在实际的语篇建构过程中,修辞和设计形成一个整体。交际者在根据语境和交际意图选择话语意义的同时,也预先选择了体现这个意义模式的主模态,而设计则主要依赖交际者对意义模式的选择,来选择相应的模态。最后,形成了修辞和设计一体化运作模式。当然,现在这项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索,通过语料库、试验、统计计算、大数据等方法来确认这项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并且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注 释

- ① 虚线箭头表示“关系”;双箭头表示体现和被体现是双向的。从编码的角度,是话语意义由模态,进而由媒体和实体体现的过程,但从解码的角度讲,是实体体现媒体,进而体现模态、话语意义的过程。
- ② 实线箭头表示“过程”。
- ③ 供用特征(affordances)概念首次由 Gibson (1979/2015) 提出,指“某个物体的潜在用途”。

参考文献

张德禄 2012 论多模态话语设计《山东外语教学》第1期。

Aristotle 2007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l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G. A. Kenn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Gibson, J. J. 1979/2015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epublished by Psycholog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Groarke, L. 1996 Going multimodal: where is a mode of arguing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rgumentation*, 29: 133-155.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Cassell.

Halliday, M. A. K. 1991 Towards probabilistic interpretations. In Ventola, E. (ed.) *Functional and Systemic Linguistics: Approaches and Us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9-61.

Halliday, M. A. K. 1992 How do you mean?. In Davies, M. and Ravelli, L. (eds.) *Recent Advanc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20-35.

Halliday, M.A.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Kjeldsen, J. 2007 Visual Argumentation i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advertising: a cognitive contextual and reception oriented approach.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43: 124–132.
- Kress, G. R. &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linages: The Gramm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 Edward Arnold.
- Kress, G. R. & van Leeuwen. 2001 *Multimodality: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 Kress, G. 2010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atthiessen, C.M.I. M. & Kashyap, A. K. 2014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different regist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Language Sciences*, 45: 1–17.
- Moral, M.G. & Ballif, M. 2000 Introdu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Rhetorics and Rhetoricians–Critical Studies and Sources*. Connecticut: Green Wood Press.
- Roque, G. 2012 Visual Argumentaation: A further Reappraisal. In *Topical Theme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Ed.) By van Eemeren, F. H. & Garssen, B. Amsterdam: Springer, 273–290.
- Slade, C. 2002 *The Real Thing: Doing Philosophy with the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
- van Leeuwen,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An Implementation Model for Rhetoric and Design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Zhang Del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roles of rhetoric and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irstly,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toric and multimodal rhetoric;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levels and nature of rhetoric and design; thirdly, it studies their respective divisions of labor, and finally, it explicates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model for rhetoric and design. It is found that: 1) rhetoric and design belong to different levels, but they cannot be implanted into any existing level, but rather lie between two levels. Rhetoric lies between the contextual and semantic levels. Design lies between the semantic and the lexicogrammatical levels. 2) The task of rhetoric is to select appropriate meaning and its patterns based on context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while that of design is to select appropriate ensembles of modes and their integrativ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meaning and its semantic patterns. 3) Rhetoric and design form an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model. At present, it still needs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research to testify the cred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is research through corpus studies, experiment, statistics, big data and other methods, and develop it further in great depth.

Keywords: rhetoric, design, multimodal discourse, meaning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model